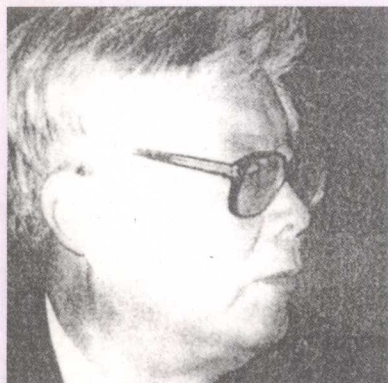




ZHONGGUO
XIANDAI WENHUA
MING-REN
JISHI

■ 海南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纪实

朱
寨
著

中国现代 文化名人纪实

朱 寨 著

海南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纪实

朱 寨 著

责任编辑:王润华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5. 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 2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海南南丰彩印制品有限公司

七二一八印书中心印刷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4.5

字数:97 千字

印数:1—1000

ISBN7-80617-899-6/I.62

定价:7.00(元)

目

次

桥儿沟的星辰	(1)
重晤鲁艺	(14)
一副光辉的笑容	(17)
人梯	(24)
诗人,生活干事	(27)
怀念井岩盾	(36)
向时间透支了生命的人	(41)
“好同志”	(47)
急促的脚步	(53)
脑力劳动者	(60)
顽强的航行	(72)
羞涩微笑的消失	(82)
情在无言中	(87)
俞平老的“书生气”	(94)
文学的旅行	(99)
意外的机遇	(103)
“一天的工作”	(107)
海外赤子情	(110)

芦沟桥上桥	(114)
饮不尽的苦酒	(117)
黄的, 兰的, 紫的, 粉的小花	(121)
再渡三峡	(126)
在文学的道路上仿佛还没有开始 ...	(130)

桥儿沟的星辰

我在延安五六年，可以说都在桥儿沟。不过主要是在桥儿沟的鲁艺。我真正成为一个桥儿沟乡的公民，却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然而这段不长的时间，却给了我深刻的感受和丰富的印象，使我梦回神往。桥儿沟是我心中的故乡。

乡政府的庭院

桥儿沟乡政府的庭院，坐落在接近山顶的高坡上。那院子不过是挖窑时顺便平整出来的坪地，院墙也主要是挖窑时削平的山壁。一面向阳的山坡，从山脚到山顶，层叠错落地布满农户人家，乡政府就遮掩其中。陌生人需要询问和别人的指点才能找到。本乡人当然不必，而且都有各自通向乡政府的捷径，往往不是从正门，而是从窑顶墙头滑溜进院子。乡政府与小学共处一个院子，而乡政府只占了一孔窑洞。这个“政府”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简陋。只有一张办公桌和几条长凳。在窑内贴墙处有两条木凳支着一张为我才设的床。小学

校本是乡政府的下属单位，倒比较气派。教室是一个两孔大的窑洞，门上有半圆的大窗户，其余两间分别住着两位老师。乡政府把自己的一份特权让给了教育。

我背着行李来到乡政府报到的时候，老乡长正坐在办公桌前调解一对夫妻的纠纷。他正以乡长的身分，用长辈的口气，半劝说，半批评，批评中常夹着“毬”这个字眼。两个人都不坐凳子，男的蹲在地上，女的倚着门框，都低头耐心地听着。老乡长说话低声细语，有些婆婆妈妈。但有时他不得不提高嗓门大声喊，因为隔壁教室里教师在高声领读。下课以后，这乡政府的院子里更是一片娃娃们的喧哗。看来他老乡长已经习以为常，并不影响他的工作。

从老乡长的劝说批评中，可以听出这对年轻夫妻来乡政府诉讼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到乡政府以后还不断来找老乡长。主要是女方坚持离婚，男方不同意。女方虽然坚持离婚，却说不出充足的理由，男方所以坚持不离，除了因为像他那样生活在偏僻后沟里的庄稼后生娶个婆姨十分艰难以外，可以看出来他确实喜爱这个俊气的妻子。老乡长虽然对男方常用带“毬”字的批评口气，对女方却婉言细语，但是听得出更同情于后生。调解的结果总是让他们回去好好地过生活。这个案子的女方一直缠着老乡长，他始终未动摇。凭他的经验断定女方背后有人在挑唆。后来清楚了，确实有人暗中挑拨，要把女方改嫁给当地女干部的弟弟。真是凑巧，后来我离开延安时，与这位女干部同行，她的弟弟作为她的勤务员，也与我们一起离开远走了。这使我更加佩服老乡长对当地人情世俗的了解。也为他松了口气，不必再为后沟里那对男女庄稼人的和好费舌操心。

乡长姓贾。贾姓在这面人家密集的山坡上是老户大姓。其他杂姓多少也与贾姓有姻亲或干亲的瓜葛。姓贾的地主富户，早在土地革命“闹红”时逃走了，不知去向。剩下来的都是一般人家。毕竟是坐地户，宅院大都在山脚，院落整齐，门前有树。贾乡长就是这样的一般人家。家里有一孔深窑，半眼小窑，夫妻俩，妻子显然比他年轻。原来养着一头牛，自耕自种不多的几垧地。自当选乡长后，不能一心种地，便把牲口卖了，耕种求亲戚帮忙，另外靠当乡长每月有粮食补贴。日子过得当然不如从前，难免受妻子的唠叨。久而久之唠叨和被唠叨都成为家常便饭，并不存心在意。他所以能被连选为乡长，一是他为人平和公正，虽然说话罗嗦，却有耐性；二是他在贾姓中是年岁最大的长辈，也就是全山坡中的长辈，有天然的群众基础；三则是他不是共产党员。当时边区实行“三三制”政策，在各级政权中都要注意吸引非党人士参政。选举时，乡支部的党员当然要努力贯彻保证。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当时边区又实行精兵简政，乡政权只有一个脱产名额，其他干部委员都是尽义务。那时的党组织已经公开，但党组织和党员还保持着当年地下党的传统，支部书记不设专职，更不是“第一把手”。党组织的活动都是在劳动的空隙，主要是在劳累了一天的夜晚进行。党员们把支部布置的任务都看得很神圣。这里的党组织，使我亲切地感觉到像人体内的心脏血脉，从外表看不见，暗中却给全乡的生活输送着活力。

来到乡上交组织关系的时候，我才知道支部书记原来是小学校的李老师。对于他，我很难用一个名词概括。他是一个地道的小学教员，与另外那位年轻的高老师一样，摇铃上课，管教学生。同时，有关学校的一切公文经费、事项杂务，都是他

管，实际是校长或主任，但根本没有这样的职位。他并没有上过正规的师范学校，甚至也没有读过多少书，并不像知识分子，却很有教学经验。他能掌握每个学生的特点，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环境，跟学生们的家长，都很熟悉，又不仅仅是老师与学生家长的关系，仿佛是邻里。在课堂上他总是声色俱厉，下课后便很随便。他的实际年龄也不过刚近中年，政治上却相当成熟老练。不然不会让他兼任支部书记。他不是本乡本区人，听那口音也不是本县人，他是上面派下来的。跟随他一起来的还有妻子女儿。妻子不识字，没有工作。女儿还不到上学念书的年龄。这是一个长期流动的家庭。全家就在分给他住的那孔窑洞里起灶生火。三口人吃他那一份额教师供给当然不够，那就靠妻子的勤俭和家里的支援了。看来岳父很顾念女儿女婿和外孙，每逢端午中秋，总是风尘仆仆地背些米面吃食来。另外一位高老师家是外乡，也在他家搭伙。他们待他像自家的亲弟弟，饭桌上融洽相让真如一家。而李老师在妻子、女儿面前却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

几乎每天晚上，李教师的窑里都有聚会。没有通知，一些党员干部也都来看一看，问一问。即使没有事情也要聊一聊。晚上，他像白天上课一样忙。不过，支部书记终究是他的兼职，他的主要任务还是教学。所以，支部布置任务后，组织执行和监督检查的责任便落在副书记赵布喜的身上了。赵布喜的公开正式的职务是乡自卫队长兼指导员，但谁都知道他党内的职务，是行动的核心人物。

赵布喜从外貌到经历，都是一个地道的陕北受苦人。紫铜色的面孔，健壮如雕塑般的胴体筋骨。他那双粗糙坚硬的庄稼人的手，已不是骨肉，而是劳动的化石。其中也记载着他在旧

社会的苦难经历。他原不是本地人，是逃荒流落在这里的，给姓贾的地主揽长工。因为他勤劳吃苦，东家一直招揽他。后来，村里的一家贾姓户主因病早逝，只留下年轻的婆姨和一个幼娃。不论从哪方面考虑，这年轻的寡妇都肯定要改嫁；而且也没有理由阻止。而这家户主是地主贾家的近支，为了不使这个花了财礼娶进的婆姨走掉，带走贾姓的一根小苗，便说服她与赵布喜成亲。赵布喜实际是做了贾家的倒插门女婿。这也就是为什么赵布喜的大儿子姓贾不姓赵的原因。

赵布喜的婆姨，长得并不俊，脸皮比较粗糙，鼻子有明显的酒糟红斑。两只缠裹的小脚格外小，小得像没有，而是两条腿直接杵立在地上，因为立不稳，必须不断地换脚移步。像这样缠脚的女人，都是靠双膝跪着劳动。她言笑拘束，却有一双皴裂的大手。一看便知，她是一个曾被封建枷锁禁锢束缚得变态的女人。赵布喜却非常喜爱她，尊重她，而且以有这样的婆姨自豪。每有来客他都首先把婆姨叫出来介绍给客人。一次延安马市长来乡检查工作，我陪着到他家去。他首先大声喊出他婆姨，让她跟马市长握手。他婆姨腼腆羞臊得不知怎样伸手，他帮婆姨把手送了过去。送过去的却是左手，反而造成婆姨的错乱尴尬。他们恩爱夫妻的欢笑容颜，完全掩盖了旧社会烙印在她身上的丑陋。

我从来没有听到赵布喜向人苦诉他在旧社会怎样不幸，也未见他在人前夸耀当年“闹红”时的英勇。但是可以看出他是经过苦难熬煎和革命锻冶的庄稼汉。他豁达乐观，爽朗愉快，高声说笑，大嗓呼叫。同时又不无提防，玩点花招。对于那自私奸滑者，不免也暗设机关，但往往是隐瞒不住，自己先失笑泄密了。他有时简直像孩子般天真。

他的家与乡政府院子相隔不远，在乡政府不远的拐角处坡下。他们父子们经常扛着犁杖，牵着牲口，从乡政府院旁窑顶的盘旋小路上山，或背着柴捆从山顶滑行般下来。在苍茫暮色中，最后出现在天幕山梁间的活动剪影，总是他们父子们。不过很快就会听到赵布喜的高嗓门。他端着大饭碗，来到乡政府李老师家，凑在一个饭桌上，边吃饭边谈工作。谈的是支部工作，而涉及的却是全乡的方方面面。两人谈得最多的是关于贾乡长。因为全县的工作，主要通过乡政府布置推行，支部不能直接发号施令代替包办，党员也只能起模范带头作用。李老师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求赵布喜和党员一定尊重贾乡长，支持他的工作。由于赵布喜与贾乡长都是本乡老户，加上与贾姓还沾亲带故，有时就不注意，在会上抢接乡长的话茬儿，开玩笑时半真半假揭乡长的短。事后李老师总是严肃地提醒他，他也像一个勇于认错的学生，愉快地承认接受。在年龄上他是李老师的兄长，而在政治和组织关系上，他却像弟弟尊从李老师，积极主动地帮助乡长召集会议，执行贯彻，做些跑前跑后的工作。

我到乡上不久，头一次到偏远的刘家沟村去布置工作，就是他主动带我去的。这本应是贾乡长的责任。除了乡长腿脚有些懒怠而外，确实因为刘家沟离乡政府太偏远。

这天晚上，他主动来约我一起出发去刘家沟。刘家沟在桥儿沟的沟里面。逆着从沟里淌出来的浅溪，我们一直往里走。开始还不断有收工下山的人与赵布喜招呼嬉笑，后来随着夜幕的降临，偶尔从远处高山上传出“信天游”的歌调，再未遇见行人。这倒给我们一个交谈的好机会。开始是些散漫的话题，后来他便向我叙述起他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故事。因为有的故

事就发生在这山沟里。

山沟越来越狭窄，山壁越来越陡峭，似乎到了山谷尽头。忽然面前显亮，山谷又分岔出两道斜向的山沟，迎面的高高山峰上有点点灯光，像天上的星星。赵布喜指着迎面的灯火说：“那就是刘村长的窑。”然后冲着那灯光大声呼唤起来：“刘村长！刘村长！刘村长在屋没？”把各家的狗都惊动了，一齐冲着山下狂咬。这时山峰高处有人应声说话，用的是戏谑的口气：“老赵你喊我啥哩？你又不是没有来过！”赵布喜便转向那声音喊：“李大！刘村长在没？新来副乡长来开会哩！”那人改变了口气，热情回答：“刘村长到外乡办事没有回来。你快引着下来吧。”

开完会已经是深更半夜，不能回乡政府。来时也估计到可能要在这里留宿。因为村长出外没有回来，李大便约赵布喜和我到他家去住。我们三个人睡在一铺炕上。吹灭灯以后，赵布喜与李大利用这个难得机会，一起叙谈起他们共同的往事来。因为怕影响我睡眠，他们都尽量抑制着激动和说话的嗓门。待我睡了一觉醒来，他们还在继续着他们的密谈。话题由过去转到了当前乡上的工作，还悄声地议论到我。其实他们并没有把我看成副乡长，而是看作鲁艺的学生。赵布喜完全像一个长者，对我充满谅解和关怀。第二天早晨醒来，李大和他的婆姨招待我洗脸吃饭，却不见了赵布喜。原来，他早走了，直接上山锄地了。这时我才醒悟过来，昨天晚上来时，他为什么特意扛上一把锄头，拿上一件棉袄。李大用嘲讽的口吻夸他说：“人家是劳模嘛！”当天晚上，他端着饭碗来乡政府，笑嘻嘻地向我道歉，他没有陪着我一起回来。

春节闹秧歌

乡政府最紧张忙碌的时间，不是农忙季节。那时乡政府里除了脱产的乡长和我，白天见不到别的委员干部，他们跟普通庄稼人一样，在山上扶犁吆喝牲口。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比庄稼人还庄稼人。他们必须在生产劳动上出众，才能在公益负担上带头。赵布喜在乡里说话所以有威信，因为他在这两方面都是模范。他们父子务农的勤苦，别人都比不上。他家的院子虽然隐蔽在山腰拐角处，但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看到他家那一年四季突出院墙外的柴垛，那是勤劳殷实人家的标志。农忙过后，特别是临过年关，一年的公粮公草的上交，年节的拥军优属等任务，都要在年节以前完成。这也是对每个委员自身表现的检验。乡委员们不断地出入来往，开会讨论。不但赵布喜，其他人也都不断地跑出院外，站在崖畔上呼叫什么人。那时乡政府根本没有电话设备，却很像有一部忙碌的传呼电话。同时另一项重要工作也在进行，筹办春节秧歌的另一套人马，也都集中在乡政府院子里。整个院子比小学生没有放假的时候还要热闹。其情景和声响，仿佛花季的蜜蜂蜂巢。不过这里看不到只受供奉的蜂王，都是工蜂，平等协作，筑巢酿蜜，营造生活。

我主要帮助编秧歌。“乡政府那摊子工作，有贾乡长和赵布喜就行了，咱们来帮着编秧歌。”李老师作为支部书记，这样对我说。当时葛洛还待命，也来参加编秧歌。大家商量决定，除了已有节目，决定新编一个宣传反对买卖婚姻的新秧歌剧。

我们集中在高老师的窑洞里（学校放假，高老师回家去了），进行集体创作。而在编剧过程中真正起了编剧作用的是

农民宋老大。宋老大不是他的正式名字。因为在他们宋家兄弟姐妹中居长，但不当家管事。生产劳动也不引人注目，平常也就很少称呼他的正式姓名。但是临到闹秧歌的时候，人们都不能不想起他。他没有正式上过学校，却粗识文字。以前爱看唱本，后来便关心新书报。他能用真嗓假嗓哼唱当地流行的各种戏曲小调。这时“宋老大”便成人们尊敬的名字。他确实有一种艺术的灵气，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戏剧的情节，主要是他想象设计的。那些最形象生动的语言剧情，都是出自他的口，或者经过他反复修改琢磨出来的。他一旦浸沉在艺术想象中，常常置别人于不顾，旁若无人，男巫下神一样，模拟着剧中人物念白哼唱，如醉如痴。一个高大的汉子，用假嗓唱着细声坤腔，格外妩媚动人。相比之下，我们倒是为了宣传目的，理智地图解政策，成了艺术的门外汉。

剧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媒婆”和“女儿”，前者是买卖婚姻的体现者，后者是买卖婚姻的受害者。演出成败全在这两个角色上。扮演“媒婆”的王拐子和扮演“女儿”的榴都是乡上秧歌队的台柱子。在每次演出中他们都是主角。王拐子因为腿拐瘸，不能上山种地砍柴，便在山下街口大道边摆一个小摊，靠钉鞋维持生活。他却是全乡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遇上排练演出，宁可几天不出摊。他经常扮演女丑角，演得滑稽夸张。在演出现场还能随机应变，插科打诨，逗得观众大笑，或惹得妇女笑骂他。他也是宋老大得心应手的好助手。每个戏都是经过他临场排演修改，才变得更加精采生动起来。

扮演“女儿”的榴是一个贫家少女，她是一个天生的小演员。她父亲长年卧炕，黄瘦咳嗽。她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尚不懂事的小妹妹。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她和她母亲的手

工。母亲纺线织布，她替人做针线。她长得圆脸大眼，一看便是纯朴人家姑娘，但纯朴中却透着俊俏灵气。因为家里困难，她没有上过学，也错过了上学的年龄。她却经常拿着针线活，倚在乡政府院门口，静听老师在教室里讲课。还经常拿着针线活到李老师窑里串门。虽然没有上过学，却认识不少字。她有一副天生的好歌喉，清脆甜润，唱起来又动情。她第一次参加秧歌队扮演《小姑贤》里的贤慧小姑，就感动了一些妇女流泪。从那以后秧歌队里没有缺少过她。她还吸引进了别的女孩子积极参加秧歌队。

王拐子男扮女装，头上梳着大髻，手里拿着长烟袋，故意用自己大幅度拐瘸的双腿，丑化媒婆的形象。他把媒婆演得活灵活现，夸张讽刺得入木三分。榴扮演的“女儿”逼真动人，演到人物的悲伤处，自己也感动地流泪。

桥儿沟乡的秧歌队，因为这个新创作的剧目，更加出了名。《反对买卖婚姻》的剧本，后来被张康同志收入最初编选的解放区秧歌剧选中。我不记得剧本曾经发表过。剧本末尾括注“朱寨记录”，可能直接选用了经我一字一句笔录下来的底本。剧作署名是“桥儿沟乡集体创作”，确切地说，应该是桥儿沟乡宋老大等集体创作。可惜从中看不到王拐子和榴的精采表演。

我们这一边编秧歌的，在严肃紧张地假戏真做；乡政府那边，贾乡长、赵布喜和委员村长们，面对严肃的现实考验，却进行喜剧性的讨论、表态、争议。赵布喜不时来报道他们那边的情况和问题，也是乘机观赏这边的热闹。本来他心里对宋老大有非议，认为象他这样高大健壮的身板，应该成为劳模，起码不应扛着轱头上山，还穿着整齐，像走亲串街，不像受苦人。他

虽然没有明说过，态度上却使人觉得出来。这时他看着宋老大编秧歌的表现，被他这另一种的刻苦劳动感动了。因为自己既不会编，也不会唱，在宋老大面前反而谦卑起来，向宋老大暗示歉意和讨好。他满脸嬉笑站在一旁，观赏得有时入迷了。

编完秧歌已临近年节。我便协助乡组织给各军烈属家分送烧柴，然后便是亲自分发黏糕、油圈、蒸馍……每到过年，各家各户都纷纷主动地把准备自家过年的食品礼品送到乡政府，转给军烈属。一时间，未来得及分发出的成箩成筐的年节食品，在我和高老师的窑洞里摆满一地。这时，各户窑顶的烟囱整天冒着烟，各家切剁烹炒的声音相闻，炊烟蒸气和着飘散出来的香气弥漫整个山坡，欢乐的年节已经是急不可耐地拍打各家门户了。

桥儿沟乡的年节最隆重的仪式，已不是各户之间互相请酒拜年，而是集体闹秧歌。不但在本乡闹，而且到外乡闹，一直闹到在全延安城郊范围的秧歌比赛大会上展足了风采。

到延安去参加秧歌比赛成了全乡最隆重的日子。这不仅展示秧歌的风采，也是展示乡政府的阵容和气势。乡政府的委员、各村的村长都要参加，或者背鼓，或者打旗。在秧歌队里没有上装表演、吹打弹拉任务的自卫队员，都束装整齐，扛着红缨枪，列队维护在秧歌队伍左右。不用说，这天的秧歌队伍格外的重彩浓颜，花枝招展，锣鼓喧天。我们的老乡长和赵布喜也改装换貌了。

虽然老乡长穿的仍然是往常那身蓝色制服，这身衣服本来是标志他是半公家人乡长身分的，却穿得松松垮垮，着去跟庄稼人的衣着没有什么两样。这天，不知他年轻的妻子是怎样帮他整饰的，腰里还佩扎了一根皮带，头上加了一顶崭新的鸭

舌帽，挺直腰板，走在队伍前面，再不是平常那样弓背哈腰，步履蹒跚。那神情俨然是一乡之长，半拉公家人。赵布喜则以乡自卫队长兼指导员的身分堂皇出面，头上扎着羊肚毛巾，腿上打着裹腿，扛着红缨枪，一身戎装，跑前跑后，更是少见的严肃威武。当队伍从乡政府院子迤逦下山出发时，各家婆姨们都抱着娃娃站到崖畔窑前观赏欢送。只有刘家沟的自卫队没来乡上集合，因为他们已事前约好直接翻山到延安去迎候了。

在这喜庆欢腾的日子里，我却意外地接到了一封从敌占区辗转寄来的家信。信封上的投寄地址写的不是延安和机关单位，而是“陕西省肤施县桥儿沟天主教堂”，当时我只能这样通知沦陷区的家人，所以信直接寄到了乡上我的手里。信的内容很简单，主要是通知我父亲去世了。我父亲的年龄并不大，与赵布喜的年龄相仿，也是一个穷苦的庄稼人。但他一生只有苦难。我并不奢望他能过上桥儿沟乡人们的生活，只希望他知道世上有这样的地方，他会有这样的生活。但他并不知道，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带着他同代人的绝望和永远的遗憾去世了。我没有哭泣。因为只有剜心的痛惜，没有了眼泪。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也像葛洛一样被调回学校待命远行。很快便带着对桥儿沟乡人们的深刻记忆和眷恋，离开了延安，到了长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去开辟工作。那时东北是一片无政府的混乱。但桥儿沟乡的记忆使我勇气百倍，充满信心，相信在这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也会建起桥儿沟乡般的乐土。现在回想起来也许觉得幼稚可笑，我在一个新打开的县城开辟工作，做的第一件事却是组织群众编秧歌，扭秧歌。我怀揣手榴弹，单枪匹马到人地陌生的农村开辟工作，也主要是眼前有桥儿沟乡人们的影子，心中有桥儿沟乡的蓝图。